

## 茅盾早期在上海的地下革命活动

钟桂松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入党最早的党员。他在建党初期,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仅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做过许多事情,担任党中央直属的秘密联络员,负责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和沟通。他秘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义务写稿,义务讲课,为党中央的负责人联系工作,自己出资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租办公场所,保管“打狗队”的武器等等,估计茅盾这些冒着生命危险贡献并不是所有人都所知道的。

## 秘密筹措党的经费

中共一大前后,党的活动经费来源非常有限,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捐助,包惠僧回忆说,当时共产党小组“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因此,党的活动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影响党活动的开展,也影响党队伍的壮大。

于是,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如何为党的发展和建设筹措资金,用于党的活动。当时,25岁的茅盾正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有支付稿费的权利。所以,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茅盾这些青年才俊在一起商量,通过什么办法为共产党筹措活动经费,解决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困难问题。想来想去,大家想到,茅盾既然有支付稿费的权利,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将翻译作品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此来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大家都说好。于是,大家动手翻译,并将翻译作品交给茅盾,让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上发表,发表后将稿费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陈望道曾经回忆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此工作。1000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李达也记得,他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时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时



(左)1916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时的茅盾 (右)1926年离馆时的茅盾

陈望道、李达他们给商务印书馆写了多少稿子,拿了多少稿费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但当时,他们将翻译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按照陈望道的说法,千字四五元,给的稿费比普通稿费已经高一倍以上,这中间,茅盾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据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当年,有人向张元济推荐稿子,包括名人的翻译稿子,张元济给的稿费是千字两元,远低于茅盾给陈望道他们的稿费。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两三元!茅盾在回忆录中也讲到,杂志上用的翻译作品的稿费,一般是“千字一元至二元”。所以,茅盾给这翻译作品千字四五元的稿费,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不过,这样的事,在当时是非常秘密的。

## 无偿为党贡献才智

茅盾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不仅为党的发展壮大通过写稿和翻译作品来筹措活动资金,而且还无偿地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茅盾在回忆录里专门讲到当年为《新青年》杂志无偿写稿的事,他说:“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

不取报酬,不是茅盾他们已经很有钱了,而是因为党的活动经费困难。所以,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愿意

无偿为《新青年》提供稿子,就是为了减轻共产党早期经费困难的压力。其实,茅盾不光给《新青年》写稿不取报酬,给《共产党》杂志写稿也同样是无偿的。后来,共产党创办平民女学,以培养党的妇女干部,茅盾和一些共产党人也是义务去讲课,茅盾记得:“平民女学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当时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都去讲课,泽民(茅盾胞弟沈泽民)入党以后也在那里讲过课。”就这样,茅盾他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我们党的初期,为了党的事业、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无私的贡献。

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大量的党务工作需要陈独秀来主持和处理。但是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所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坚决主张陈独秀回到上海来主持全党工作。这一年的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但是他到上海后就失业了,生活困难。这时,正好商务印书馆的领导有意向要聘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借助名人效应提高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知道茅盾和陈独秀认识,就请茅盾去与陈独秀联系,征求陈独秀意见。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不知道茅盾与陈独秀的关系,所以此事正好和回到上海的陈独秀的处境需求不谋而合。这样,通过茅盾的联系沟通,陈独秀的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又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党务工作了。茅盾晚年在回忆录中说:

1921年秋,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陈独秀必须回上海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派我向陈独秀探询。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

## 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

茅盾当时除了凭借自己的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提供活动经费之外,还自掏腰包为党的事业买单。

徐梅坤是当时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茅盾、俞秀松等是徐梅坤的同事,徐梅坤回忆,当时“兼区”的“区委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都集中在上海。我现在能记得的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施存统、张大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启汉、杨明斋、李震瀛、邵力子、杨贤江(商务印书馆编辑,于1922年5、6月间入党,可能由我介绍入党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时来时往,流动性很大,有些人不参加会议,所以开会时人员从未到齐过。”

徐梅坤还披露当年茅盾自掏腰包为中共“区委”租办公室的事。他说:“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设在成都路中段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每月由沈雁冰(茅盾)拿出五元钱租赁费。沈雁冰当时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一百元,他用自己的薪水来资助党的活动。”

中共三大以后,对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工贼”以及党内的叛徒、奸细等情况,党决定成立特别支部,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党内叛徒、奸细等。由徐梅坤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徐梅坤接受任务以后,专门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特工组”,徐梅坤回忆说:“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在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党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以后我从意大利军舰上买了四支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茅盾)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队,就是以后的‘打狗队’。这是共产党早期秘密活动中一个片段,但是这是需要茅盾一家冒极大的风险的。”

茅盾在共产党成立前后,为党的发展壮大,默默无闻地在上海做了大量秘密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百年,但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今天重温起来,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作者系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常委、原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 文人轶事

##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稿酬

杨建民

1971年,启功先生接到通知,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辑部报到,主要担任校点《清史稿》的工作。这段工作,按启功自述:“于是我迎来了‘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由此,他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启功的著述,学术含量高,文字又畅通达,是深受当时出版社关注欢迎的。譬如一部《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接受出版过程中,启功与责任编辑之间,关系和谐。对编辑提出的不论内容观点的问题,还是行文表述的意见建议,甚至小到一个个标点,他都愿意充分考虑。据编辑记述,他在的一封信中诙谐地说:“抗日时有一歌中有句云‘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拙稿中必有荒唐谬误处,敬请毫不客气奋笔直攻,不必细致地赐予商量也。因改歌词中之‘鬼’字为‘稿’字,即请向大刀向拙稿处砍去为荷!”还

以汉语专业词汇加强:“鬼、稿双声,更有充足理由也!”

不仅认真如此,启功还宽厚体贴。中华书局是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特色的专业出版社,这类著述学术专业性强,一般情况下印数较少,销售慢,经营利润也自然有限。他的《汉语现象论丛》出版后,考虑到这些方面,在编辑给他开稿酬时,他提出不要出版社支付现金,而希望把所有稿酬都用来买书。买来的书,少数送给他,其余几百册《汉语现象论丛》全数留在编辑室,以便赠送需要此书的专家或读者。后来编辑作说:“我明白,先生是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华书局分忧,支持中华书局工作啊!”

一个学者,他的学问不仅仅体现在纸面上,而应该是融会在精神骨髓中,并在现实中努力践行。启功的作为,就是这种精神及实践的具体体现。

## 文人轶事

## 阿甲题梁金生画像

刘兴尧

阿甲(1907—1994),武进溇里镇人。自小拜师学京戏。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考上鲁迅艺术学院。后从事戏曲工作,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编剧兼导演,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梁金生和姚淑萍夫妻分别是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和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1941年,他们在延安结婚,夫妻俩为延安的保育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6年,梁金生被党中央秘密派往越南(安南)开展革命斗争。在谈判桌上,他喝下了国民党特务投下的毒酒,牺牲在越南的战场上。那一年,姚淑萍才28岁。

在延安时期,阿甲与梁金生夫妇也有一段深厚的交往过程。当时阿甲正在延安进行京剧和评剧研究,梁金生正在延安进行教育工作,两个人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阿甲提出要给梁金

生创作一幅头像画,梁金生愉快地答应了。头像画好后,梁金生十分满意,一直收藏着。后来梁金生赴越南进行革命斗争前把这幅头像画留给了他的妻子姚淑萍,成了他重要的遗物之一。

1987年9月15日,姚淑萍同志前去看望阿甲,拿出一幅她爱人梁金生的头像。阿甲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他40年前在延安时期给梁金生同志画的头像。姚淑萍说梁金生于1946年在支援越南革命斗争中牺牲,所以她一直将这幅画携带在身上几十年,这中间虽然几经劫难却失而复得,实属不易。但因时间久远历经劫难,画底已经破损不堪了,题字也变得模糊不清了。阿甲感慨不已,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延安英姿勃发的梁金生。于是,他重新在画像上写下:梁金生同志像,以示留念。同时也表达了对梁金生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

## 文人轶事

## 容庚的爱才惜才

张雨

容庚出身于清末书宦世家。1922年,经罗振玉(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推荐入北京大学研究国学,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赏家。

有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生计划招收2名,有6人报名,成绩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容庚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当年被罗振玉先生“破格”收入门下之事,他也想不拘一格把他们6人一并录取。然而,按学校的招生计划只能招收2名,这就意味着有4名优秀的考生不能入校学习。爱才惜才的容庚,不舍如此优秀的考生从自己眼皮下消失。于是,容庚找到学校领导说:“他们6个人都考得这么辛苦,考试成绩那么好,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都招进来吧,多加一双筷子就可以了。”时年85岁的容庚,已经多年没有带研究生了,学校领导看他如此爱才惜才,就破例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陈永正、陈抗、唐钰明、张桂光、许伟建和陈初生6人,成了容庚的关门弟子。

容庚视生如子,对他们关爱有加,

无微不至。他不顾自己的年事已高,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宿舍看望学生,不仅会给他们带去书籍,还会检查他们的读书笔记,并传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学生们很珍惜这段宝贵时光,次次都能有新的收获。每当容庚很晚才从宿舍出来,学生们都要送他回家,他总是摆摆手说:“我在这里走了几十年了,又不是不认得路。有这些时间,你们还能多读点书!”

学生每次去容庚家中求教,他总是满面春风、热情相待,将学生带来的问题一解解。家中的藏书,不少是孤本珍籍,学生们借回去看,容庚也总是有求必应。学生告辞时,他总是以下楼散步为名,把学生送到楼下,还要走到路边,目送他们远去。

当年的6名研究生,如今都已成名成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初生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容老提携与关爱,就没有现在的我,容老对我是有再造之恩的,他是我一辈子的偶像及贵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果能交到一位关心自己呵护自己的良师益友,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 齐白石画菘写苍生

郑言

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生最爱吃白菜,也喜欢画白菜,通过他的妙笔,将思想情感融入寻常的白菜之中。他曾说:“客见余画菜,谓曰:‘用墨浓淡不一,何也?’”余曰:“此苍生色。”他把画菜的浓淡墨色喻为人民群众的“苍生色”,笔墨中饱含着对百姓苍生的深情厚谊。他的白菜图因白菜赋予了深刻的含义,雅俗共赏、感染力强,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力量。

白菜古时称“菘”,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特别是到了唐代,白菜被广泛种植,并且是宴请宾朋的一道佳肴。古人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之说。美食家苏轼有诗云:“白菘似羔豚,冒土出熊蹯。”把白菜与羊羔、熊掌相媲美。其味道之鲜美可见一斑。《本草纲目》说白菜:“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瘴气,止热气嗽。”正因为白菜为健康蔬菜,齐白石特别喜爱,民间流传着好多齐白石以白菜图换白菜的趣闻轶事。

齐白石出生于平民世家,早年在家乡时自己亲手栽种白菜,进京定居

后,仍然如此,他经常说“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香”。他曾在为友人所作的《白菜图》上,这样题道:“他日显扬,毋忘斯味。”其思乡情结合往日艰难生活的情景,时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齐白石在有关白菜的题句中,所表示的“不是独夸根有味,须知此老是农夫”,“不独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正是对自己农民本色的写照。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白菜特别适合用写意水墨来表现,浓淡干湿,酣畅淋漓。齐白石画白菜多用大写意之法,画中主体先以淡墨晕出整体效果,然后以浓墨破之,最后再用浓墨勾勒出脉络,以墨色浓淡干湿的变化来突出主体的层次,质感明显。齐白石一生画了很多白菜,其中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画面上点缀着几个鲜红的辣椒,并题句说:“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白石老人对“蔬菜之王”白菜遭到不

公平对待而愤愤不平。齐白石在一幅《白菜冬笋》题跋中写道:“曾文正公云:鸭汤煮萝卜白菜,远胜满汉筵席二十四味。余谓文正公此语犹有富贵气,不若冬笋炒白菜,不借他味,清汉筵席真不如也。”可见白石老人对白菜的钟爱程度。

“清白传家”是齐白石画白菜时常用的画题,几笔浓墨挥写出菜叶,用小笔破墨勾勒,使菜叶墨色丰富,层次分明。然后再用淡墨勾出白菜帮的轮廓,简单几笔画出白菜的根须,好像带着泥土的芳香,四棵健壮、新鲜、颜色深浅不同的白菜便错落有致、恰如其分地呈现在画面上,栩栩如生,田园气息浓郁。在齐白石的笔下,极为普通平常的白菜,便成为一幅素雅、生动而又颇具内涵的清白图,道出了白石老人清清白白、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和为人信条。他也以图告诫世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或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齐白自幼年贫苦,拾柿充饥是常有的事。晚年尽管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对过去“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生活仍难忘,“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所以白菜与柿子常常出现在他的画作中。《世世清白图》两棵清白色的白菜,两个熟透了的红柿子,巧妙地合构为一图而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寓意。简约而不空洞,以少胜多,突出主题,这也是齐白石艺术的魅力。

## 文人轶事

## 宿白与“白沙宋墓”

付裕

1951年,在修建白沙水库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工地发掘出数百座墓葬,其中有3座仿木砖砌结构的宋代家族墓,许多精美的壁画保存完好。1951年秋到1952年秋,是修建白沙水库工程最紧张阶段。1951年12月上旬,考古发掘队到达水库工地。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对最早发现的古墓进行发掘、清理,这就是后来被业界所称的一号宋墓或赵大翁墓。1951年12月,经过国家白沙宋墓考古发掘队共同努力,一号宋墓墓室的大量淤土清理完毕。次日,考古队员点燃了盏大煤油汽灯。叶浅予、董希文等人借助灯光,对墓室内的壁画进行记录、临摹。

1952年1月10日,一号宋墓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由于这座宋墓墓室上有内容为“元符二年赵大翁……”的题记,以及该墓地券中有“大宋元符二年九月十日赵某……”的字样。考古人员又在一号宋墓的西北方向20米处、东北方向16米处,各发现了一座和一号宋墓形制类似的墓葬,分别命名为二号宋墓和三号宋墓。

三座墓葬中,年代较早的一座修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据墓中文字,墓主叫作赵大翁,身份应是当地的地主或商人。另两座墓葬在赵大翁墓

北,相对简略些。当时,白沙宋墓所在位置属登封县天中乡崤山村。据了解,仿木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流行于北宋末年中原和北方地区,白沙宋墓是这类墓葬中保存较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一组。

1954年,宿白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开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

多年过去,《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同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2001年3月,白沙宋墓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21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作为北宋晚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的考古发掘,白沙宋墓不论在墓葬的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筑细部和彩画制作,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是空前的发现,也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北宋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窗口。

